



海基能力概念的演变及与空海一体战概念的互动

Evolution of Seabasing Concept and its Convergence with AirSea Battle Concept

李健, 中国陆军退役中校 /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所长 (Li Jian, LtCol, PLA Army, Retired; Director of Knowfar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hina)

Seabasing 一不依赖作战区域内的陆上基地, 从海上部署、组建、指挥投射、重建及重新运用联合力量。另参阅“两栖作战”词条。

——美军联合出版物 JP 1-02 《国防部军语词典》2014 年版
(http://www.dtic.mil/doctrine/dod_dictionary/)

序言

很少有人注意到, 美军国防部军语词典没有收录 seabase (海上基地) 这个词条, 原因不言自明, “海上基地”原本不是新词或新生事物。人类自有战争以来, 就知道运用海上能力支持包括陆地作战、两栖作战、海上机动等在内的军事行动, 海上基地作为一种支持作战的方式一直在演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跳岛作战”中凸现出来的海上后勤, 到 21 世纪初“持久自由”行动中的前沿部署, 越来越体现为远离本土从海上直接提供作战保障, 甚至直接融入作战行动。随着美军全球战略日益系统化、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急剧调整、战场环境发生剧变, 以及军事技术快速发展, 基于海上的后勤保障已经从“下意识”的传统作战方式, 向“主动”的联合集成转型。尽管各军种从自身角度和利益出发, 对“海上基地”的理解各有不同, 相互争吵和攻击也时有发生, 但“海上基地”终究向着“海基能力”(seabasing)方向演进, 最终在美军各军种之间逐步统一了认识, 从原有的“海上基地”物理平台概念逐步升华为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 并与后来出现的空海一体战概念互相交织, 呈现逐渐融合趋势, 成为美军全球战略的海上支撑。

一、冷战结束到2002年: “海基能力”概念应运而生

美国海军陆战队 J·W·哈蒙德中校早在 1971 年《陆战队公报》上发表题为“海上基地: 真正的两栖作战”, 文章称: “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在滩头建立阵地来实施两栖作战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切断岸基基础设施的脐带, 包括海滩、海滩出口、斜坡、机场和港口等, 并完全从浮动的基地上行动。海上基地是两栖部队的公共领域。”¹ 这一观点可以说很具代表性, 基本代表了当时人们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冷战结束之间对海上基地的普遍认识, 认为海上基地在本质上是一种海上的后勤能力, 是一种将部队与装备物资投送上岸的海基后勤保障方式, 向岸上部队提供短期或者长期维持服务。惯于及时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美军, 在研究与审视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马岛之战中由海上发起的战役时, 充分肯定了海基后勤在历次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同时, 也开始思索海上基地的更大作用。

但是, 在《海军学院报》1991 年 4 月刊一篇名为“一路向前”的文章发表之前, 人们对“海上基地”的概念整体上还停留在为消除传统两栖登陆作战中的“铁山”而进行

的海基后勤保障上；而“一路向前”的发表，引发了美军就“海上基地”的概念内涵及其潜能的长达20多年的辩论。“一路向前”的作者强烈呼吁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应重点关注沿海地区，并提出了“以新的海上部署模式和力量构成来维持支援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国家建设、安全援助、维和、反毒品、反恐、反暴乱以及危机反应所需的前沿存在”的濒海作战新思维、新框架。²这犹如一根导火索，引发了正在重新寻找敌人而进行战略调整的美军、特别是海军陆战队与海军对海上基地作战新应用的关注。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在广阔的海洋上失去了可以匹敌的舰队，美国海上力量的基本目标已从“实现对海洋的控制”转向“利用对海洋的控制”，加之美国海外基地的减少，这为“海基能力”概念日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此背景下，美国海军首先进行了“由海向陆”战略思想转型的探索，1992年发布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提出了海军濒海远征作战和联合部队推动的概念；1994年发布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增加了对“力量投送、战略核威慑、战斗可靠前沿存在以及通过海上基地提高灵活性”的强调。³对海军而言，似乎已找到了未来海上战略思维的方向，“远征、前沿、濒海、向陆”成为描述战略新思维的热门词，但实现这一全球性海上战略思维调整的途径却还感觉影影绰绰，尚未找到着力点。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寻找未来战略目标时自然而然回归到了传统——两栖作战。在1996年1月4日，海军陆战队第31任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签发了海军陆战队顶层概念文件《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在探讨“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概念所带来的一些训练和装备收益时，克鲁

拉克上将指出：“海基能力将把海军陆战队员从建设岸上设施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全身心投入于救援工作中去。由舰艇到目标的机动能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把兵力直接投送到最需要的地区，包括那些远离港口和机场的地点。⁴由此，“海基能力”概念正式出现在美军的官方文件中，拉开了对由海军陆战队最初引导的“海基能力”概念进行专业化探讨的序幕。

1997年12月30日发布的《2010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报告中，海上基地被定义为海军陆战队未来三大重要能力之一。⁵1998年6月发布的《海基后勤》报告也对海基能力概念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探讨和分析。⁶1999年7月，海军陆战队第32任司令签发的《海军陆战队21世纪战略》中继续丰富了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的系列概念。⁷

2001年11月发布的《远征战机动》文件进一步探讨了海基能力和海基部队的相关性：“海基能力支持多样化的、灵活的力量投送。海基能力将使部队可以直接从舰上投送到深入内陆的目标，对传统的阶段性的两栖作战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海基行动将使海军力量投送的效果最大化，对联合部队指挥官部署和使用海军远征部队有巨大的帮助。海基能力并不只是一系列平台，它是多种平台的网络化……。”⁸

因为海基能力与海军陆战队的关系最为紧密，是海军陆战队实现未来“远征机动战”中“舰到目标作战机动”战法的核心赋能因素，因而海军陆战队既是海基能力思想的始作俑者，也是最积极的鼓吹和推动者。

从1996年到2002年，美国陆军未来概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使用大型飞机部署和支援陆军部队。这就要求美国陆军花费巨额资金来购置飞机或依靠空军支援，迫使陆

军转而寻求通过海运方式来部署和支援陆军的行动。这就为日后陆军也开始积极参与海基能力概念演进打下了伏笔。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冷战结束后至2002年这一阶段，随着美军向联合作战调整，在寻找新的战略目标和开拓新军事概念之际，各军种不约而同将注意力集中于海上，为发展由海向陆的“途径”而聚焦于“海基能力”。新的战略目标、新的国际环境，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军事技术革命和军事思想革命，在这诸种因素合力的直接影响下，勇于前瞻的美军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赋予传统“海上基地”以新的内涵，从此，表现为静态感的名词 seabase 即海上基地逐步演变成更具动态感的 seabasing 即海基能力。

二、“9.11”事件至2004年：“海基能力”概念遇冷错乱

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后，美军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全球反恐。如果说从冷战结束至2002年这一阶段为海基能力概念提供了成长的沃土，随着美国以全球反恐为首要目标的新外交政策的进行，对海基能力的探讨暂时被搁置，但并非废止。作为一个大概念，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始终都在为这个概念的成熟与发展不断努力。为此，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设置了海基能力集成部（GS-15），专门负责海基能力发展相关事宜；海军作战部能力与资源集成部（N8）下属的远征作战部（N85）专门设置了海基能力集成分部（N85V），⁹ 具体负责二十一世纪海上力量中的海基能力相关事务，负责海基能力的作战概念、能力等的开发，以及改善发展线路图，评估海基能力平台的组成系统，参与海上基地项目的需求与发展过程；而陆军则由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例司令

部下属的陆军能力集成中心具体负责相关概念的研究。

但是由于各军种与各研究机构已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为“海上基地/海基能力”进行定义，“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概念经常被混淆。各军种对海基能力定义的不统一，造成了人们对海基能力定义的困惑。与此同时，前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10-30-30”（10天速控30天速胜30天速移）作战原则，使原本就不清晰的海基能力概念更加混乱。正如长期支持海基能力的海军退役上校萨姆·唐格瑞迪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人们以各种相互冲突的方式定义海基能力。”¹⁰

在此期间，各军种、智库以及一些独立的防务专家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抱着不同的认知，撰写发表了众多学术论文与军种文件，并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为“海上基地”和“海基能力”进行定义、诠释。在用词上从原始的“seabase”逐渐衍生出“seabasing、sea basing、Sea-Basing、Enhanced Networked Sea Basing、Joint Seabasing”等多种形式，并且含义各不相同。尽管发展到最后使用频率慢慢集中于“seabase”与“seabasing”两个，但也还是常常将“海上基地”与“海基能力”概念混为一谈，经常出现两者混用的现象。对于海基能力的矛盾心理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对海外战争的本质更加宽泛和不确定的认知，也反映出美军最高决策者对未来战争无法准确预测的焦躁心理。军种间的利益之争、庞大预算和海基能力自身概念还存在先天性缺陷等因素，也是造成海基能力概念混乱的重要原因。

2002年6月，美国海军根据国防部2001年版《四年防务评估》的要求，出台了《海军转型规划纲要》。这个纲要系统论述了建设“21世纪海上力量”的构想，提出了未

来美国海上力量实现转型的三个新的基本作战概念——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基能力，以及转型的方法。在这个纲要的基础上，2002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维恩·克拉克发表了题为“21世纪海上力量——投送决定性的联合能力”的文章，除了进一步阐述上述概念外，提出了海军“总体作战概念”以及在这个概念下海军未来的兵力结构。¹¹ 这位海军领导人将海基能力和海上打击、海上盾牌、部队网并列为未来实现转型的四大核心能力。

2002年10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共同颁发指导新世纪战略转型的构想——《21世纪海军力量》，以共同推动和倡导海基能力概念。这样既密切了与陆战队的“伙伴关系”，更好地体现联合性，也是海军追求自身利益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3年5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布了《联合作战的海洋作战概念》文件，描述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2020年之前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将如何在多种类型军事行动中做出贡献，将海军陆战队的“远征机动作战”同海军的“21世纪海上力量”概念结合到一起。¹²

2003年8月，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共同发布了《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文件，该文件被认为让“海基能力的概念比《联合作战的海洋作战概念》深化了一步”。¹³ 文件中将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定义为：“根植于一系列海上系统和资产的一体化能力，使海上和岸上所有维度的海军力量投送效应最大化。它对于原来的海上接近和组建、有选择卸载和使用网络化分散部队在海上重构的分阶段海军投送能力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受到了部队网的推动，促进了所有类型军事行动中的联合作战。”¹⁴ 实际上，该定义很容

易让人觉得海基能力就等于未来海上预置部队，但毕竟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由于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的执着，也引起了国防部高层的注意，经负责采购、技术与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特许，国防科学委员会成立海基能力特别小组，对海基能力展开了一项调查，并于2003年8月发布名为《海基能力》的调查报告。¹⁵ 报告以《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为出发点，在充分考虑《2010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的基础上，通过从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总结的经验，得出四条主要结论：

(1) 海基能力是美国一种关键的未来联合军事能力。海基能力有助于确保美国进入拒绝为美国提供支援设施的地区；

(2) 未来对海基能力的需求将远远超过当今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

(3) 海基能力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要协调式、螺旋式发展的努力，以解决公认的事宜并建立联合海基能力“体系”；

(4) 美国应该实际测试海基能力，以解决问题，并研究所有军种的领导技能（强调独创性）。¹⁶

此报告的出台，充分说明海基能力已吸引了美国国防部内部的极大关注，创建致力于发展海基能力的联合机构已是众望所归。该报告可以说是海基能力概念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2003年11月，修订版《海军转型路线图》发布。文件指出“海基能力是一项国家能力，是我们的基础性转型作战概念”。¹⁷ 文件中虽然没有对海基能力进行详细描述，但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海基能力作为海军支柱性作战概念的地位。

在此阶段，尽管美军上下的注意力均集中于伊拉克与阿富汗，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深知自身未来战略使命，并未在此“混乱阶段”放弃对海基能力的探索。特别是在2004年7月，国防部联合资源监督委员会（JROC）决定将海基能力直接踢出采办计划之后，更坚定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规划者们开始一起推进海基能力建设的决心。

三、2005年至2010年：“海基能力”概念定形成熟

海基能力的支持者认为，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基能力概念将使对战场上部队的支援和运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大规模联合部队的赋能器。

2005年3月，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中强调的8种关键作战能力几乎都与海基能力有关联，特别是“在遥远的反介入环境中投送和维持部队的能力”。¹⁸ 这部文件还提出了通过主要作战基地体系、前沿作战地点、合作安全站点以及联合海基能力来改善美军海外部队态势的必要性，并指出联合海基能力为海外军事态势的转型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在此背景下，2005年8月1日，美军出台了《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该文件更加详细地分析并阐述适用于2015年到2025年的相关概念，并首次为海基能力界定了一个通用定义。由此，关于海基能力的概念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使各军种对联合海基能力的定义以及联合海基能力作为一种手段对未来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达成共识。《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中对海基能力的定义为：

“海基能力是指从海上快速部署、组建、指挥、投送、重建和重新运用联合战斗力，

在联合作战区内不依靠陆上基地为装备精良的联合远征部队提供持续支援、物资供应和兵力保护。这些能力拓展了作战机动手段，确保海上进入与介入。”¹⁹

2006年3月，以国防战略提供的指南为基础，《海军陆战队应对变化安全环境的作战概念》发布。该文件阐述了一系列更新的概念，其中指出：

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是我们濒海力量投送的概念基础。海基能力提倡的是一种快速接近、运用和维持全球来源部队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为总统和联合部队指挥官克服发展变化的安全环境带来的挑战提供更多的政治军事选项。²⁰

2006年版的《海军作战概念》延续了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的思路，并提出海基能力是支持远征性力量投送和预防性安全合作最主要的手段。关于安全合作方面，这份文件还首次提出使用全球舰队兵站来验证海基能力。

2006年8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布了海军海战出版物/海军陆战队作战出版物NWP3-62M1MCWP 3-31.7《海基能力》，²¹ 最终将海基能力概念转变成了条令文件。²² 这份出版物为在多种类型军事行动（从主要作战行动到民事支援）中从一个海基能力实施当前和近期的行动提供了条令指南。该出版物的发布，可以说是海基能力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由此海基能力由概念逐步向具体的作战应用发展。在该出版物中对于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的定义直接引用了2003年11月修订版《海军转型路线图》中的关于海基能力与海上基地的描述：

“海基能力作为一种国家能力为投送、维持海军兵力与联合部队提供首要转型作战行动概念，借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海

上作战行动的独立国部队、分布式与网络化部队的机动作战来保证联合介入。”海基能力包括海上控制、确保介入和兵力投送等传统海军任务，重新重视远征机动战。

海上基地本身是一个分布式网络化平台的集成体，具有机动性和灵活伸缩性。通过这些平台可以从海上向全球投送进攻和防卫兵力，并且在联合作战区内不依靠陆上基地就能组建、装备、投送、支援和维护部队。

海上基地可灵活伸缩，通过集成全部海军陆战队部队，扩大和缩小规模以完成任务要求。集成部队包括远征打击部队（ESF）、航母打击群、远征打击群（ESG）、具有特种作战能力的陆战队远征队（MEU（SOC））、水面打击群（SSG）、两栖部队（AF）、海上预置部队（MPF）、战斗后勤部队（CLF）舰船、陆军海上计划以及跨国部队（MNF）等。²³

此后，在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发布的一些官方文件中，进一步就海基能力的作战运用阐明了观点。例如，2007年6月，第2版《海军陆战队应对变化安全环境的作战概念》中称，“海基能力将使我们具备从海上的国际水域发起行动的能力，从而可以确保作战机动和进入权利。”²⁴ 2007年，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了《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文件。²⁵ 这一文件充分吸收了两版《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和2006年版《海军作战概念》的观点，反应了近20年来的海基能力概念发展过程。2010年版《海军作战概念》中认为，海基能力不仅仅是可以用来支持多种类型军事行动，而是它可以为美国提供一种适用于新安全环境的非对称优势。²⁶

在随后的日子里，各军种以及防务智库的研究人员纷纷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性文章，

以极高的热情多次讨论海基能力概念及其运用。至此，从“海基后勤——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认知过程基本完成，其概念内涵不断发展、延伸、清晰、完善，逐步形成了共识。海基能力概念混乱局面得以终止，渐趋成熟，确立了较为权威性的界定。

事实上，联合作战早已成为美军的基本作战形态，以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这也必然要求各军种广泛参与，形成联合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国家经济不景气，战争需求牵引不强的背景下，只有顺应形势，支持和积极参与到哪怕是军种擅长的职能领域建设中，才能更好地保住自己的预算份额和影响力。因此，由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职能内的海基能力，经过海军陆战队不懈鼓吹、海军配合助推、陆军积极参与，从军种作战概念发展到国防部未来重点发展的九大联合集成概念之一，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海基能力概念的提出，不仅直接影响到海军、海军陆战队的转型思路、作战概念发展、装备项目建设，而且对其它军种、国防部、造船行业等也有相当影响，甚至直接影响美国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大战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军内部对海基能力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关于战略的辩论。而如今，美军对海基能力的辩论几乎变成关于造船的辩论，以及关于在国防预算紧缩的情况下如何优化海基能力平台的辩论。另一方面，即使未来海上预置部队概念逐渐消亡，海基能力概念依然存在。例如，机动式登陆平台的改造、联合高速船从陆军向海军移交、以1比1的比例用舰对岸连接器计划等，也充分说明了海基能力已从一个前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项目”。

陆军对“海基能力”的认识和参与较晚。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之后，在海空军提

出“空海一体战”构想时，陆军逐渐认识到未来一段时间内，像在前两场战争中那样由“战地靴子”唱主角的机会已经不多，只有顺应国家安全战略关注重心东移的趋势，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存在价值，在与其它军种的竞争中保持主动，于是开始思考在应对未来新兴大国崛起形成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中陆军的定位与使命问题。在2013年确定的2020年美国陆军的总体目标与兵力设计原则中，已明确了“基于海基能力有能力实施联合作战”的具体目标，并提出由于目前陆军训练模式并不支持陆军整合进海上基地，应把海基能力嵌入到未来旅战斗队训练之中的呼吁。

四、与“空海一体战”概念交织互动

从以上美军对海上基地/海基能力的认知的演变过程及其定义中可以看出，海基能力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是利用海洋作为运用和维持海军和联合部队的一种思想；是构成未来海军核心作战能力的“核心支柱”和指导新世纪美国海军转型的顶层概念之一；是为应对新兴大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而需重点发展的联合集成概念；是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有效途径方案，并有潜力左右未来几十年的美国大战略。

从另一个角度看，海基能力的外延又是多层次的：源于对海基后勤支援的思想，而成为海上预置概念的一种升级；是使用多种海上平台在很广阔的海域中执行并维持联合作战，克服了距离因素的限制之后，以谋求促进联合作战样式的创新；以有形的海上基地为中心形成强力控制区，而成为未来美国海军控制海洋最为核心的强有力手段；通过海基能力，美国能够以最小的政治代价和印迹实现对利害区域的介入，从而最大限度提

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是未来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前沿存在之关键性支撑。

尽管在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并没有提到海基能力这一概念，但随着美军全球反恐战争的结束，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兴起，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始于上世纪末的海基能力概念与后来的空海一体战概念，无论在其内涵或外延上都有着很大的趋同性。海基能力的思想对后来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形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种概念，均是以海军为核心的“海军—陆战队—陆军”或“海军—空军—陆战队—陆军”军种联合模式，只不过后者比前者的目标指向性更强，后者的内涵与外延范围更广泛。

从近几年美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来看，新的更多用途、更灵活的两栖船坞运输舰、干货弹药补给舰、机动式登陆平台、大型中速滚装船甚至是下一代航空母舰的组合，也正在逐步实现最初海基能力的目标（即使不是全部），旨在为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不依赖岸上基础设施在海上执行特定任务和使命的能力。就连前海军上将詹姆斯·霍洛韦在其自传《战争中的航空母舰》一书中都认为，“随着美军全球战略的调整，以航母为核心的航母战斗群已过渡到如今的航母打击群，已融入美国海军目前正在倡导的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之中，成为海上基地组成部分”²⁷——这不得不说，海基能力概念为日后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在作战概念方面，陆军上将马丁·邓普西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正努力将海空军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发展成为更具联合性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从而将陆军参与包括在内，并在陆军联合海军陆战队提出“夺取和保持作战进入（权）”后，将其与“空海一体战”并列，作为支撑“联合作战介入”

的下属概念。在这些构想中，无论是位于顶层的“联合作战介入”作战概念，还是其子概念“空海一体战”和“夺取和保持作战进入（权）”，如果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从海上发起战役机动战”的海上战场支撑点，都将会成为空中楼阁、一纸空谈——尽管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海基能力概念又适时地充当了这一关键性的角色。

由于海基能力是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联合集成概念，从军种乃至国防部推动的角度而言，更多是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寻求各自发展的立足点，因此争夺资源的因素不可忽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而言，则是希望提高战略实现手段的机动能力、生存能力、灵活性。只有当国家战略需求与军种未来发展两者合一时，概念发展和实践才有基础。但是从目前美国面临的威胁形势、防务资源以及能力需求来看，存在不少矛盾之处。一方面，威胁和任务更多样化，对美军能力的需求更加复杂，单纯的技术优势和数量规模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军事能力的多样化运用渐成重点；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困境，美军可用的防务资源相对萎缩，预算逐步成为制约能力发展的重大瓶颈。由此推断，“海基能力”的未来发展和实践必将面临重大的挑战和风险。

首先是资源争夺的风险。美国的全球海上控制权尚未打破，这是海基能力持续有效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海基能力依赖海上控制，美国海军要发展海基能力平台，前提就是要维持好现有的舰队，那么预算和资源就要加大投入。尽管与空海一体战概念相关的发展计划似乎会将空军和海军的合作带到一个高峰，但是海基能力和全球打击概念对于资源的潜在争夺，在防务预算紧缩的环境下将不可避免。和国防部未来重点发展的其它八个联合集成概念相比，海基能力概念尽管显得更为基础，这又需要大幅颠覆目前美军的全

球军力存在模式，所以也可能被视为“最不现实”还遭摒弃的理念。

其次是战略错位的风险。海基能力概念是一种减少陆地存在、降低政治风险的联合集成概念。对陆地存在的谨慎首先源于美国对战争历史的基本认识，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甚至目前接近尾声的伊阿两场战争，美军的地面部队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越南战争的政治代价甚至波及整个社会。另一方面，这种谨慎还源于世界一体化的现实潮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的发展，世界各国对外国军力存在的敏感度越来越高，接受度越来越低。从这个角度看，海基能力概念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海基能力”能否真正取代前沿存在的“陆基能力”尚存疑问，这种取代能否为同盟国所信任也不得而知。事实上，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是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海基能力”的出现会有可能对这种结构产生破坏效应，“海基能力”的成功是否足以弥补联盟战略的失败，将会是一个重大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鉴于海基能力与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内在联系，可能最佳的策略是将其进一步融合，以优化资源分配。据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2013年9月份称，海军将不再使用“seabasing”或者“sea base”这两个术语。²⁸这无疑是在验证笔者上述的猜想。一些迹象表明，尽管可能会导致原有海基能力概念发生新的变化或定义，但新概念和原来的概念目标应该是保持一致的。

五、结语

毋庸置疑，从“海上基地”到“海基能力”，能进行长达20余年的辩论，这也充分说明其价值的所在。自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兴起，两

个概念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但在美军战略重心转向亚太背景下，受国防预算缩减、技术难度等的影响，两个概念平行发展已不可能。海基能力概念（或术语）将来是否存在已无关紧要，其原有的概念目标完整地嵌入空海一体概念是必然的。事实上，美军正是如此操作的。

尽管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的海军战略和作战构想不尽相同，但以军事行动为政治目标服务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提高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对中国海军来说同样重要。从这一点上讲，海基能力概念对中国海军来说也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对越来越严峻的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上。例如，就目前的南海海域态势来看，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大量领土和海洋资源纠纷。在解决主权争端时，如果一旦外交途径失效，非要运用军事手段之时，对中国而言，由于南海海域各岛屿岛礁不具备建设大型军事基地的条件，其远离本土进行夺岛作战的困难是巨大的。所以，基于中国海军现有实力，建设海上基地，以海洋为机动作战空间，将会对中国通过军事手段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的完整提供有力的支持。♣

注释：

1. 摘译自美国海军陆战队《陆战队公报》1971年8月刊（总第18期），作者 J. W. Hammond，文章原标题为“Seabase: The True Amphibious Operation”。
2. H. Lawrence Garrett III, Frank B. Kelso II, and A. M. Gray, “The Way Ahead” [一路向前],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April 1991, pp. 36-47.
3. Jay L. Johnson, Admiral, USN, “Forward... From the Sea - The Navy Operational Concept” [前沿存在——由海向陆], <http://www.navy.mil/navydata/policy/fromsea/ffseanoc.html>
4. C.C. Krulak, General, USMC, “Operation Maneuver from the Sea” [从海上发起的战役机动战],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4 January 1996), p.19, <http://www.alliancegeostrategie.org/images/mccp-1-omfts-1998.pdf>.
5. US Marine Corps, Maritime Prepositioning Force 2010 and Beyond [2010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30 December 1997), <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ship/docs/mpf-2010.htm>. 该文件还特别指出：2010年及以后的海上预置部队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当传染病对于友军部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或者当事国并不希望美国有大规模军力存在时，海基的医疗支援设施和宿舍可能显得特别重要。此外，舰船装载着大量的物资和装备预置在海上，在战争以外多种类型的军事行动中都非常有用。食品、医疗物资、动力装备、通信器材、车辆以及水净化装置在许多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灾害救援行动中就非常有用。
6. US Marine Corps, Sea-Based Logistics [海基后勤],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June 1998), <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ship/docs/sbl.htm>.
7. James L. Jones, General, USMC, Marine Corps Strategy 21 [海军陆战队 21 世纪战略],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3 November 2000), p.4.
8. James L. Jones, General, USMC, USMC, Expeditionary Maneuver Warfare [远征战机动],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10 November 2001), p.4.
9. 2012年3月，作为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海军远征作战局从 N85 调整为 N95，置于新的海军作战部负责作战系统的副部长办公室的领导之下，设有海上基地科（N95V）。
10. Sam J. Tangredi, “Seabasing: Concepts,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海基能力：概念、问题和建议],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Autumn 2011, Vol. 64, No. 4, p.28, <http://www.usnwc.edu/getattachment/d49d4281-7790-435d-9b3f-c7df59fb1544/Sea-Basing--Concept,-Issues,-and-Recommendations.aspx>.
11. Vern Clark, Admiral, USN,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二十一世纪海上力量——投射决定性的联合能力], October 2002, <http://www.navy.mil/navydata/cno/proceedings.html>.

12. Vern Clark, Admiral, USN, and Michael W. Hagee, General, USMC, Naval Operating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联合作战的海军作战概念], (Washington, DC: Dept. of the Navy, September 2003), p.1.
13. Edward Hanlon, Jr., LtGen, USMC, and R. A. Route, RADM, USN, Enhanced Networked Seabasing [增强型网络化海基能力], (Washington, DC: Dept. of the Navy, 2003), p.1.
14. 同上。
15.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ea Basing [国防科学委员会特别小组的海基能力报告], August 2003,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Washington, D.C. 20301-3140.
16. 同上, p.xi.
17. “Naval Transformation Roadmap 2003: Assured Access & Power Projection……From the Sea” [海军转型路线图 2003 : 确保介入和兵力投射……从海上], (Washington, DC: Dept. of the Navy, 2003), p.2,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AD=ADB295445>.
18.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国防战略], (Washington, DC: Dept. of Defense, March 1, 2005), pp.12-16.
19. “Seabasing Joint Integrating Concept” [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 Version 1.0, 01 August 2005, p.11, <http://www.dtic.mil/futurejointwarfare/jic.htm>.
20. “Marine Corps Operating Concepts for a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海军陆战队应对变化安全环境的作战概念], Mar 2006, p.1,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a446044.pdf>.
21. Navy Warfare Publication 3-62M/Marine Corps Warfighting Publication 3-31.7, Seabasing [海基能力],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and Headquarters U. S. Marine Corps, August 2006), http://www.quantico.usmc.mil/download.aspx?Path=./Uploads/Files/SVG_007_NWP%203-62%20MCWP%203-31.7%20Seabasing.pdf.
22. 这部分内容详见《美军海基能力研究》译丛之二——《2 海基能力：未来美国海军海上能力的聚合》第 2 章内容。
23. 见注释 22, p.1-3.
24. “Marine Corps Operating Concepts for a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econd Edition [海军陆战队应对变化安全环境的作战概念第二版], (Quantico, VA: Marine Corps Combat Development Command, June 2007), pp.9-10,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a446044.pdf>.
25.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21 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 <http://www.na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
26. “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 [海军作战概念], <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
27. 詹姆斯·L·霍洛韦三世著, 吴志丹、顾康敏、陈和彬译, 《战争中的航空母舰》,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第 416 页。
28. 参看 R.Wilson, From Sea Base to Shore, The 'Sea Base' is dead, but sea basing is alive and well [从海山基地到陆岸：海上基地虽消亡, 海基能力茁壮成长], <http://www.defensemedianetwork.com/stories/from-sea-base-to-shore>.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退役中校, 重庆大学无线电专业工学士, 历任雷达技术工程师、武器装备采办参谋、综合计划处副处长等职。退役后, 创办全球防务网站, 专注于战略与防务研究。后于 2009 年创办中国首家独立的民间防务智库——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并于 2013 年正式获批, 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政府组织 (NGO)。自从事战略与防务研究以来, 主持并参与出版各类军事书籍近百部, 发表文章数十篇。